

摘

译

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10

1975

摘 译

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10

1 9 7 5

上海人民出版社

摘 译

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一九七五年第十期(总第十期)

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本书在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 字数 113,000

1975年10月第1版 1975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2171·90 定价: 0.37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 苏联的“经济改革” ·

- 苏修“经济改革”陷入绝境梁 锋(1)
时间的考验〔苏〕Л·勃里亚赫曼(4)
苏联社会主义的公司化〔美〕利昂·斯慕林斯基(22)
茨罗宾工作法进工厂〔苏〕Л·舒姆斯基(29)

· 商品货币关系 ·

- 苏联社会面面观北京大学俄语系(32)
汽车“死魂灵”〔苏〕《真理报》(33)
在“秘密”的掩盖下〔苏〕《真理报》(37)
机灵鬼是怎样得救的〔苏〕《真理报》(41)
在高高的木板围墙背后〔苏〕《真理报》(45)
他们多么恼火〔苏〕《真理报》(48)
救命啊!〔苏〕《真理报》(51)
值钱的手迹〔苏〕《真理报》(52)
你要“伏尔加”还是“莫斯科人”?〔苏〕《劳动报》(54)
熊的道德〔苏〕《真理报》(57)
能挣钱的洋娃娃〔苏〕《真理报》(61)

• 国际政治问题 •

葡萄牙独立遭受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

.....〔美〕《号角》月刊(65)

德斯坦完全改变了法国反对欧洲政治统一

的看法〔美〕《商业周刊》(72)

第二和第三世界之间团结的加强.....〔美〕《号角》月刊(78)

安哥拉报道〔美〕肯尼思·L·阿德尔曼(82)

• 国外农业问题 •

美国农业的困境.....〔美〕威尔逊·克拉克(101)

日本的幻想:食品自给.....〔美〕罗兰·A·米尔豪泽(106)

菲律宾的土地改革.....〔美〕本尼迪克特·柯克弗莱特(113)

* * *

西伯利亚散记.....〔美〕罗威尔·汤姆斯(127)

三十年后的广岛〔美〕K·M·克莱(133)

评罗斯托的新书:《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美〕唐纳德·F·戈登(136)

评松下幸之助著《如何挽救崩溃中的日本》一书

.....〔日〕《人民之星》报(141)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

——评马克思:《资本论》

.....〔俄〕伊·伊·考夫曼(145)

美国经济学动态(156)

苏修“经济改革”陷入绝境

梁 锋

利别尔曼的“经济改革”，自从在苏联推行以来，已经满十年了。十年“改革”，情况如何？本刊本期选译的几篇文章，可资鉴别。其中，苏联经济学博士勃里亚赫曼的《时间的考验》一文，既介绍了十年“改革”的过程，又供认了苏联国内一片混乱的“改革”情景，是难得的自供状，建议读者一读。

勃里亚赫曼的文章一开头就谈到，时隔十年，关于“经济改革”的评论，在苏联国内，依然是“众说纷纭，论调各异”。据他归纳，大致有四种观点。一是悲观派，“变化任其多，不脱旧窠臼”，认为“改革”并没有获得“大”的结果。二是乐观派，认为万事顺利，“改革”有为。作者指出，这多是一批不熟悉经济情况的书呆子观点。三是对“改革”持有异议：“是否非改革不可？”不满的情绪十分显然。至于作者本人，当然是属于“不偏不倚”的第四种观点了：虽然困难重重，却是“史无前例”，“非改不可”。摆出了一副复辟资本主义的死硬派的架势。

在苏联，为什么长时期来对“经济改革”一直是议论纷纷，这不是可以发人深思吗？在今日苏联，除了那些不着实际的“乐观派”以外，从上到下都无法否认，以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企业自

治为特点的利别尔曼“改革”，已经给苏联国民经济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这从勃里亚赫曼的文章中就可看到：

大企业乘机获利，小企业亏损倒闭。小企业一无资金，二无权力，根本沾不到“改革好处”的边。为了图生存，避免受大企业的排挤，唯一的一条路就是“钻空子，在品种、价格和协作上招摇撞骗”。

生产脱节，市场混乱，贿赂成风，捐客横行，到处是一片追逐暴利的无政府状态。里加灯泡厂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一九七三年，由于灯泡管底用的薄钢片供应经常断档，工厂被迫停工。是因为薄钢片的生产缺乏原料？是因为计划中的遗漏？是因为轧钢厂任务过重？都不是。原来，毛病出在轧钢厂嫌薄钢片“油水不足”。连勃里亚赫曼也无法否认，这是苏修不得不吞食的苦果。

企业大权在握，经理神气活现，给苏修中央统治集团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而后者不得不大叫难以“集中统一”。这种叫嚷，反映了随着“改革”而来的苏修中央和地方之间、部门和企业之间勾心斗角、激烈争夺的紧张局势。

这些，都是勃里亚赫曼的文章透露出来的。实际情况当然要严重得多。但仅仅从这些透露出的情况来看，“经济改革”这个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重要步骤，给苏联国民经济造成的混乱也够触目惊心了。经济上的混乱造成了苏修统治集团的政治混乱。各种各样的药方都开出来了：有的说，依靠电子计算机的“神力”，可以加强“集中领导”；有的说，看来物质刺激不是万能的了；有的说，问题还出在现有“改革”本身。尽管各有各的药方，不过，根据作者介绍，被选中的还是进一步强化“经济改革”。这中间包括：实行完全的经济核算制，使企业在国家面前完全“独立自主”，即“国家对企业不负有义务，企业对国家也不负有义务”；实行联合公司制，由垄断企业干脆把各小企业并吞；强行

实施排挤工人攫取超额利润的“谢基诺试验”、“茨罗宾工作法”。一句话，进一步强化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制度。

这些“改革”的补充措施，都是在最近的两三年当中实施的。结果如何呢？按照勃里亚赫曼的说法，仍是矛盾重重，阻力很大，进展不快。这种形势，确实使苏修叛徒集团寝食为之不安。

事实上，苏修的“经济改革”早已陷入绝境。国民经济的一切混乱，完全是苏修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造成的。苏修的“经济改革”，是为了把苏联经济完全、彻底导入资本主义的轨道。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引起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加剧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已经而且将进一步激起苏联广大人民的抵制和反抗。这后一方面，是勃里亚赫曼之流大叫物质刺激不灵、“经济改革”失效的真正原因。尽管苏修叛徒集团进一步推广“谢基诺试验”之类的敲骨吸髓的措施，但可以肯定，这不但不能克服由于“经济改革”带来的国民经济混乱，而且必然更加激起广大苏联人民的仇恨和反抗。苏修“经济改革”崩溃之日，将是苏联人民奋起之时。社会帝国主义的寿命决不会很长了。

时间的考验

〔苏〕Л·勃里亚赫曼

自从苏共中央一九六五年九月全会决定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了。在那一年出生的孩子现在都已在二年级读书。然而环绕着改革，人们依然争论不息。

三 种 观 点

象在所有的争论中一样，关于经济改革尽管众说纷纭、论调各异，但逐步逐步地终于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较多的是企业的经理以及厂里的一些工作人员。“变化任其多，不脱旧窠臼”，这一条法国谚语也许倒是较为确切地表达了这类人对改革结果的悲观主义的情绪。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А·阿汉别基扬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介绍了在一次专门调查中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一千零六十四名企业经理所谈的意见。其中百分之八十的人诉说，上级机关仍然象以前一样给工厂规定了必须遵守的成本、人员定额等各项指标，根据经济改革条例，他们这些企业领导者，理应是有权自行决定的。

《真理报》上的这篇文章指出，这种侵犯企业经济核算权的事件并不是孤立和偶然的，而是相当普遍的。同《国营工业企业条例》的规定相反，生产计划经常被调整，但财务指标却不作相

应的变更。这意味着吞没了经济核算制单位所挣得的利润。被征询意见的百分之九十的经理，包括几乎所有大工厂的领导人在内，至今还是认为必须从根本上扩大各企业单位的经济权。A·阿汉别基扬指出，近年来，“有一些部门正在逐渐地回到被党谴责过的即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的方针上去”，而对经济刺激提高生产的作用却认识不足。

第二种观点，是一些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专家、新闻记者等人的观点。一般说来，这些人惯于从总体上思考问题，但对生产的情况却不熟悉。改革正在顺利地进行，企业单位已转变为完全经济核算制。现在只要善于利用这种崭新的、极为有利的经营条件就可以了。

这一乐观主义观点的拥护者们拥有令人信服的论据：几乎所有的工业和交通运输单位都转入新条件下工作（那些计划亏损的矿场、林业局、实验工厂和一些在相当恶劣的条件下经营的经济核算单位除外）。在当前第九个五年计划里，许多建筑公司和部属科研、设计机构，以及许多商业单位和服务部门正在实行向新经济体制过渡。

例如，请打开一九七四年国民经济计划。社会主义经济的利润总共是一千零四十多亿卢布。其中百分之四十三点四留给企业支配，用于完善技术、扩大生产及刺激工作人员。经济刺激基金几乎占了利润和其他收入中的二百一十亿卢布，比一九七三年多百分之九点三。而且，按计划刺激基金的增长速度要比生产量快二分之一。这一切难道不是证明了改革的力量和现实性吗？也许，经理们关于经济机构不够完善的牢骚怨言只不过是企图用“客观原因”来掩盖那由于自己的不善组织所带来的损失。

第三种观点：是否非改革不可？也许，扩大企业单位的职权

是得不偿失，反而招致恶果？着眼于提高自己局部利润的经济核算环节是否纳入旨在为公众、为全国造福的中央计划体系内呢？

有这样的事实：苏共二十四大就曾指出，有一些单位为了追逐轻而易举的利润，肆意抬高产品价格。他们把产品改头换面，以次充好，标以新价，而又不因提高价格而受到统计部门的注意，因为这是另一种新的产品。但从顾客看来，这种新产品并没比老产品好，可是卖价却贵了。这种情形在器皿餐具、家具甚至在设备供应上，都是经常发生的。

怎样利用这笔不属于中央投资的利润呢？工厂有了钱，就可以开始建设。建设的项目则完全是根据工厂领导的需要：仓库、房屋甚至是专供来访的检查大员们休息的芬兰式浴室。这些，当然都不是按照中央计划的要求去支配紧张的建筑材料。于是，就造成了许多祸害：捐客，贿赂，最轻的也是按照“你给我、我给你”原则进行的非法交易。

上面的三种观点，都有事实为根据。

但是事实毕竟还不是全部的真理。要对改革的成就和问题作出客观的评价，只能站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不囿于几棵孤立的、即使是丰满粗壮的树木，而要把整个森林，从林间小道一直到最边缘地带，一起全盘考虑，才能得到。

改革的现实性

首先，那种关于在按新体制工作的几年中，没有什么根本性改革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是闭眼不看事实。也许，因为这些人成天“泡”在经济生活的中心，所以他们对于这些潜移默化逐步而来的改革，没有明显觉察到。

我们把一九六五年和一九七四年比较一下。对于工厂集体来说有些什么变化呢？变化是很多的。

第一，评价企业工作的标准不同了。在一九六五年，实际上只有一条标准，即把工作的实际结果同计划相比较，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集体奖金是根据超额完成计划的情况而颁发的。

这种情况对于战前和战后不久那几个五年计划年代是适用的。那时要求不惜任何代价来完成计划，至于企业的潜力，上面是能够盘算估量出来的。但是今天情况不同了。仅仅依照超额完成计划的情况去给予评价，势必造成大家贪图任务轻，对计划机构和财政机构掩盖自己内部的潜力。而现代的大型工厂由于它那庞杂繁多的产品品种以及五花八门的复杂的技术过程，以致无论那一个检查员或视察员，如果没有工厂全体人员的帮助，都不可能发现它的潜力。“上面”尽管经常有些委员会到企业单位来检查，但是他们的大多数都是依靠“下面”厂里的经济专家们准备的东西来了解情况的。这不算是秘密吧？

现在对全体人员生产的评价是按三条相互有联系的标准来进行的。超额完成计划的情况，特别是那些燃料、金属、化学产品和民用的高级产品，在施行奖励时是要考虑这一条的，但也只能是评价的因素之一。奖励基金的基本部分取决于企业生产比上年增长的程度和在该部门及同类企业中所处的水平。

评价企业集体工作的指标体制调整了。在一九六六年以前，类似的指标有三个：总产值、商品量以及降低成本后的节约额。现在考虑的是产品销售额、利润、赢利率（即利润对生产基金值之比）。

这样的调整是什么意思呢？在改革以前，一切衡量标准都是环绕着产品数量的。因此，尽管一件制品也卖不出去，商品生产的成绩照样可以是出色的。如列宁格勒的缝纫机工厂，在一

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五年中，虽然他们的产品因质量降低削价销售仍无人问津，但由于超计划地降低成本，仍得到了大笔奖金。这些卖不出去的大衣和服装的削价所造成的损失大大超过了虚假“节约”下来的数目。可见，这种制度只是适应于战争前后那些年代的条件。那时，不管什么货物，人们都争相购买，根本不敢奢望什么超时髦的商品，不会去追求什么汽车的美观性。

现在的标准是建立在销售产品、即订户已付款的产品的基础上。没有结算帐户的进款，就完不成计划。这比无论何种训诫都更有效。虽然财务部门按传统在工厂行政机构里占据着最不引人注目的房间，但是今天在这里不仅看得到总工程师、设计家，还可看到工人社会活动家。人们千方百计地削减堆放在工厂仓库里的滞销品的数量。企业单位甚至不惜提高成本借以改进制品质量。至于改进质量所化的费用，自有顾客来付。比如列宁格勒的机床制造者们过去在降低生产费用的速度方面虽然无可炫耀，但是出口产量却增加了四倍，国家和机床联合业因此获得了额外的利润。

新体制还有一个优点。在此以前，各单位都对如何向国家取得更多的投资感兴趣，因为这有利于增加生产总额、增产商品和节约成本。而现在的赢利率指标的分母里是该企业生产基金的总值。大家都知道，分母愈大，分数值就愈小。各企业开始考虑把自己的申请同预期的利润相一致。在一九七四年苏联国民经济计划中，工业生产增长百分之八点六，利润增加了百分之十二强，可不是偶然的。

第三个新事物——建立了平衡各单位奖励条件的机构。对于资本家来说，利润是鉴别成功的普遍尺度。滥肆开发丰富的油层，垄断新技术，向竞争对手保密，由此得到的利益，给私有者牟取了特殊的盈利。一切东西，成本越低就越有利。

对我们来说，只有跟企业工作质量相适应的利润，才是奖励该企业集体的标准。要做到这一点相当困难，因为企业的经营条件各不相同，而计算利润的卢布却彼此平等，对它们的来历人们是不作任何调查的。

基金收费，这是经济平等的第一个环节。企业每年必须将国家投资的机器、设备、储存和其他生产基金价值的百分之六上缴预算。投资越多，付得也越多。

借比较优越的自然条件和运输条件而获得的利润也不能成为奖励的理由。拥有丰富的矿产区，廉价的原料、燃料、未经开发的采木区等条件的企业，要以地租和固定缴款的形式上缴一部分自己的利润。此外，国家对同一货物的支付的钱也有所差别。举例说，同一吨煤，一种是从顿巴斯和沃林狭窄陡削的矿层采掘来的，另一种是从库兹巴斯或是从耶基巴斯图兹丰厚的煤层里采来的，对前者付的钱就要多。

在许多机器制造部，工厂上缴给部的新技术基金是同它的产品销售额多少成比例的。而这笔基金经费的拨用取决于新技术在工厂规划中所占的比例。因此，经常带头为技术进展开闢新路的厂家，可以从那些老是跟在人家后面走路的厂家的利润中获取一份额外数目的经费。另外，由提高价格和出售旧的生产设备等方面而获得的利润也不用上缴预算。

最后，第四点……即使是悲观主义的经济学家，也不能否认在改革过程中建立的经济刺激基金的意义。在许多先进的企业里，每五个卢布的劳动报酬内就有一个卢布是由基本工资之外支付的，也即由改革所建立的奖励基金支付。企业的利润成为组成工人们收入的重要来源。

新的计划体制和经济刺激体制有助于克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某些不良倾向。资金周转的加快，促进了利润的增长，也使基

金效率，即每卢布生产基金的销售额不再降低。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上指出：“过去几年的经验表明，党在实行经济改革时，正确地估计了形势，对完善国民经济的管理工作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同时还有许多问题远未解决。”

经济核算制过时了吗？

在整个一九七三年，里加灯泡厂由于作灯泡泡头用的钢带供应不正常，生产一直时断时续。申请书按时打了上去，基金也拨下来了，计划任务在负责供应的工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定径厂也得到了核准……但是钢带还是没有。写信到自己的部和冶金部去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倒是几家兄弟单位颇表同情，贷给了少量钢带。

事情出乎意料地解决了，关于这家工厂的苦恼反映到了《真理报》。一星期之后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运来了八十多吨钢带。里加厂总算完成了计划。但是这个完成是花了怎样的代价啊！工厂经理和他的助手们的绝大部分时间不是用于关心完善生产，而是去寻觅材料。请问，由于生产组织的不完善致使成千个小时都“付诸东流”之后，要说服工人们珍惜每一分钟难道是容易的吗？

《真理报》的工作人员对此事进行了调查。象通常一样，在开始时，负责供应的工厂推说任务过重，而部里，则借口计划中遗漏掉了。但是，最后还是搞清了：既不是任务过重，也不是计划的差错，其实是因为生产这种薄钢片无利可图罢了。一心想自己获利，供应者拣中了“油水足的”——拼命生产大规格的厚钢带。有利可图的订货永远是轧进“截止期”的。而没有“报告”的工作，那就得“从缓”，放在季度末或是年终。到那时再要完成

订货实际上已经不可能。

毛病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是原料资源缺乏吗？一九七四年的计划已经对保证国民经济的燃料、金属和化学制品的供应预先采取了措施。同时，还看到，苏联在采掘煤、铁、石棉、锰和其他一些矿藏方面，在世界上是遥遥领先的，而焦炭、水泥、石棉混凝土板、钢筋混凝土以及钢铁、木材的产量，也是举世无双的。

是经营者和计划者的觉悟和纪律性差吗？苏共中央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全会指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消除违反计划纪律的现象（包括破坏物资技术供应，财务计划同建筑材料、设备、燃料、原料、配套零件、金属供应的脱节，等等），也就是要抛弃所有那些因不负责任、低水平的领导、肆意挥霍人民钱财而造成的不良现象。

在一般的经济情况中，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并不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形式，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定径厂中断对里加厂薄钢带的供应决不仅仅是出于对奖金的喜爱。提前完成计划吨数，也就意味着得到上级对企业成就的嘉奖和赞许，意味着该企业领导者威信的提高。

但是，难道不能用电子计算机的调节力量去替代可恶的物质刺激吗？ACY（自动管理体系）这个新名词进入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几年。在一九七四年，自动管理体系还只有六百五十台，它们负责管理技术进程，管理企业，自动整理全部部门的情报。自动管理体系的能量很大，它们能记下在所管的对象的成百项指标中的变异，即刻加工和记下所得到的资料，从成千种可行的活动方案中选出最佳方案来。但是，自动管理体系这种神奇的力量能否取代经济核算制，从而给每一个工人指出通向目标的捷径呢？

有些自动管理体系的设计家完全忽视他们活动中的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照他们的意见，改革管理的问题仅同加强电子计算机的能量有关，建立统一的计算中心网和加强它们的数据可靠性有关。至于经济核算制，照他们的意见，仅仅是在理想计划纪元到来之前的权宜之计。可是今天的一切，并不只是加加减减，套套公式，或是用电子计算机便可包罗一切的。否则，这岂非成了个万能的萨满教者了吗？

即使是站在数理经济学的立场上来看，这种经济核算制有时论也是不经一驳的。按照经济控制论的奠基者之一诺沃日罗夫的计算，苏联国民经济分配资料的可能方案的总数达 10^{500} 。十的五百次方，这是一个天文巨数，比至今为止科学可知的最大的具体数目——可见世界的原子数还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管怎样的电子计算机思考体系都不可能在一个可能接受的期限内计算如此繁多的方案。因此，关于中央统一领导各企业所有的业务活动等想法只是幻想，至少在目前一代的时期里，它是实现不了的。

在国民经济的所有环节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这是苏共中央一九六五年九月全会规定的极其重要的改革方向。完全经济核算制是国家同企业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它是建立在经营单位的经济自主、收支完全相抵、物质上的利益和责任这样一些基础上。在通向这样的经济核算制的道路上，我们暂时还只是迈出了最初的一步。

在完全经济核算制条件下的经济独立，意味着企业资金在经济周转中的实际独立。这种独立原则是在列宁的一份法令中指出过、并且载入现行的章程中去的：“国家对企业不负有义务，企业对国家也不负有义务。”

这条原则丝毫不会危及较为重要的中央计划任务，也不意